

封闭管理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应对方式和成人依恋的链式中介效应

尹锡杨 李 悦 倪亚丽*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00)

【摘要】 目的：考察封闭管理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成人依恋和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541名高职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t 检验显示，封闭管理后T2（2020年3月）较封闭管理前T1（2019年10月）显著下降；T1—依恋回避—消极应对—T2路径中介效应显著（95%CI：0.001~0.008），应对方式和成人依恋在其中起着链式中介作用。结论：封闭管理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有显著负面影响，成人依恋和应对方式是高职学生封闭管理期间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

【关键词】 心理健康 SCL-90 成人依恋 链式中介
DOI:10.19494/j.cnki.issn1674-859x.2023.03.037

国内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封闭管理期间个体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悲伤、紧张、恐慌和失眠等一系列心理问题^[1]。国外研究发现，疫情防控期间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各因子均分和阳性症状检出率均显著高于疫情前期的水平^[2]。以往研究多以横断面研究为主，研究结果多是某个时间段内的心理健康情况调查，缺乏民众在疫情前后以及疫情不同阶段持续检测和追踪分析研究。然而，要形成完整的心理研究链条，研究疫情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内在机制，需要对疫情前后的心理变化规律进行纵向分析^[3]。

新型冠状病毒会使人产生心理应激，对此，个体会采取一定的应对方式以恢复内在心理平衡，否则就会产生心理危机^[2]。应对方式是个体在应激中所采取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它影响个体应激反应的性质和强度，也调节应激反应

与结果之间的关系^[4]。新冠疫情流行期间高职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心理韧性对焦虑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5]。居家隔离期间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影响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Bar-Haima认为父母依恋是个体早期与父母形成的一种持久而紧密的情感联结，是焦虑的缓冲系统^[6]。依恋的两个维度，即依恋焦虑和回避与问题行为和心理困扰呈现显著正相关^[7-9]。有研究者发现，疫情防控期间个体的应对方式部分中介了依恋焦虑对购物行为的影响^[10]。另外，在成人依恋的测量中，研究者争论较多的问题是成人依恋量表问题。亲密关系经历量表对大学生依恋状况有着较准确的解释作用，因此，本研究同样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作为测量工具。综上所述，应对方式和成人依恋可能是高职学生封控期间维护个体心理健康潜在的保护因素。具体而言，应对方式可能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即积极的应对方式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可能对其起负面作用。而且，心理健康水平不高的个体，可能封闭管理对其影响更大。然而迄今为止，较少有研究系统地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在疫情居家隔离的背景下，以往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阐述三者间的关系。因此，

基金项目：1. 2022年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校级一般课题“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变化规律及保护因素探究：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项目编号：KY2022012）；2. 广东省2021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德育专项）（项目编号：2021JKDY073）；3. 2021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基于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条件下手机成因与大学生人际关系质量的研究”（项目编号：2021WQNCX288）。

本研究提出假设, 高职学生的成人依恋和应对方式可作为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缓解封闭管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一方面, 本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封闭管理、依恋关系、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认识, 以期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另一方面, 也可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干预提供可操作的干预途径。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和流程

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抽样设计, 学生在封闭管理前T1 (2019年10月) 完成SCL-90量表, 共调查650人。然后, 他们在封闭管理后T2 (2020年3月) 完成SCL-90、ECR量表和CSQ。T2期间共收集了541份有效问卷 (其中女生204人), 脱落人数为109人。

1.2 方法

1.2.1 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该量表由90个题目组成, 包括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感觉、情感、思维、意识和行为等方面的内容。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方式, 分数越高则该项的问题越严重^[2, 3]。该量表包括10个因子: 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症状、恐怖和其他。本研究使用心理健康症状来代表心理健康水平, 心理症状越多, 则心理健康水平越差。本研究中,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8。

1.2.2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ECR)

该问卷由Brennan等人编制, 共有36个条目, 采用Likert 7点计分, 从1分 (非常不赞成) 到7分 (非常赞成)。Brennan等人通过因素分析得到两个维度, 即依恋焦虑、依恋回避, 各由18个条目组成。本研究采用李同归等修订的中文版ECR量表^[8]。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77和0.82。本研究中将条目中“恋人”关键字全部更改为“父母”来测量与父母的亲密关系, 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90、0.68。

1.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该量表共有20个条目, 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 (分量表) 组成, 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 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

采用0~3四点计分^[8, 9]。本研究中, 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7。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多重共线性相关统计量的方法诊断多重共线性的判断指标TOL和VIF值的大小。结果显示, TOL值分别为0.88、0.82、0.72、0.87、0.72, VIF值分别为1.13、1.22、1.4、1.15、1.4。按照一般标准, 本次回归分析中不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11]。

2.2 新冠疫情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症状的影响

为考察疫情前后两个阶段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症状的变化情况, 分别对每个学生的SCL-90的各因子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从表1可以发现, 与疫情前期T1心理健康症状相比, 时隔半年后的T2心理症状受新冠疫情影响明显, 各因子均值呈现上升趋势: ①躯体化症状, $t=5.99$, $P<0.01$; ②强迫症状, $t=11.21$, $P<0.01$; ③人际关系敏感症状, $t=7.7$, $P<0.01$; ④抑郁症状, $t=5.85$, $P<0.01$; ⑤焦虑症状, $t=8.7$, $P<0.01$; ⑥敌对症状, $t=2.52$, $P<0.05$; ⑦恐怖症状, $t=4.97$, $P<0.01$; ⑧偏执症状, $t=6.86$, $P<0.01$; ⑨精神症状, $t=5.73$, $P<0.01$; ⑩其他症状, $t=5.75$, $P<0.01$ 。

表1 T1和T2不同时期心理症状对比

症状	N	T1 ($M \pm SD$)	T2 ($M \pm SD$)
①	541	1.21 $\pm$ 0.37	1.3 $\pm$ 0.35
②	541	1.54 $\pm$ 0.54	1.76 $\pm$ 0.52
③	541	1.41 $\pm$ 0.54	1.56 $\pm$ 0.5
④	541	1.32 $\pm$ 0.48	1.42 $\pm$ 0.49
⑤	541	1.29 $\pm$ 0.45	1.44 $\pm$ 0.44
⑥	541	1.3 $\pm$ 0.47	1.35 $\pm$ 0.44
⑦	541	1.25 $\pm$ 0.43	1.33 $\pm$ 0.45
⑧	541	1.27 $\pm$ 0.45	1.36 $\pm$ 0.42
⑨	541	1.31 $\pm$ 0.42	1.36 $\pm$ 0.37
⑩	541	1.31 $\pm$ 0.45	1.42 $\pm$ 0.46

2.3 应对方式和成人依恋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追踪研究分析策略^[12], 链式中介模型可以较好地解析多个中介变量的相互作用, 可以较好地阐明多个变量间的内在作用机

制。第一步,数据统计方法采用罗吉斯回归分析(PROCESS)3.5中的模型6对T1心理健康症状、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应对方式和T2心理健康症状之间的链式中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依恋焦虑、积极应对方式对该中介模型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不显著。T1心理健康症状可以显著预测疫情防控期间个体的依恋焦虑($\beta=0.05$, $P<0.01$); T1心理健康症状($\beta=0.09$, $P<0.01$)、依恋焦虑($\beta=0.12$, $P<0.01$)和依恋回避($\beta=0.07$, $P<0.01$)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 T1心理健康症状($\beta=0.09$, $P<0.01$)、依恋焦虑($\beta=0.12$, $P<0.01$)、依恋回避($\beta=-0.03$, $P<0.05$)和消极应对($\beta=0.22$, $P<0.01$)显著预测积极应对; T1心理健康症状($\beta=0.5$, $P<0.01$)、依恋回避($\beta=0.35$, $P<0.01$)和消极应对($\beta=0.35$, $P<0.01$)显著预测T2心理健康症状,而依恋焦虑($\beta=-0.03$, $P>0.05$)和积极应对($\beta=0.3$, $P>0.05$)则不能显著预测T2心理健康症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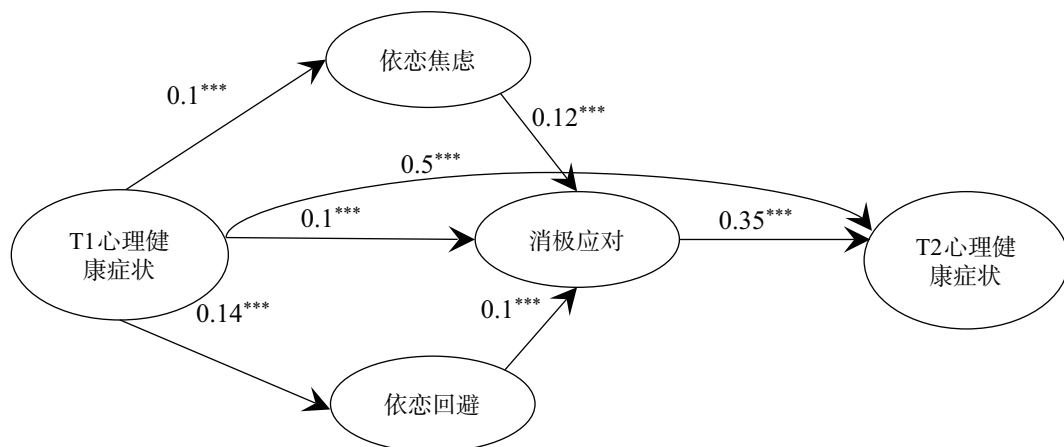
第二步,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取5 000次样本,对以上各个路径进行检验,并估计95%置信区间(95%CI)。结果显示(图1), T1心理健康症状对T2心理健康症状的直接效应为0.5;而T1心理健康症状—依恋回避—T2心理健康症状,95%CI是[0.021, 0.078]; T1心理健康症状—消极应对—T2心理健康症状,95%CI是[0.007, 0.055]; T1心理健康症状—依恋焦虑—依恋回避—T2心理健康症状,95%CI是[0.002, 0.011]; T1心理健康症状—依恋焦虑—消极应对—T2心理健康症状,95%CI是[0.001, 0.004]; T1心理健康症状—

依恋回避—消极应对—T2心理健康症状,95%CI是[0.001, 0.008]。以上路径的效应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所以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和消极应对在T1与T2心理健康症状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上述路径中介效应值为0.1,占总的效果量的16.67%。

3 讨论

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也有不少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疫情暴发给人们的心理健康带来的威胁。而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了高职学生新冠疫情前期和流行期间的心理状况的变化。与疫情前期相比,高职学生SCL-90各因子分数明显上升,这表明在疫情流行期高职学生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一方面,疫情作为重大的心理应激源,对已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可能产生叠加影响,从而引起更严重的心理应激反应,心理健康状况更差。另一方面,在居家隔离的防疫要求下,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家人的依恋关系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与家人关系的恶化可能会导致个体在居家隔离期间以更消极的方式来应对心理压力,导致个体心理健康状况在疫情流行期表现得更为糟糕。

本研究侧重对比疫情前期和流行期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效填补了跨时间维度的研究空缺,为疫情期心理研究形成一个完整的心理研究链条,弥补了横断面研究的不足。横断面研究发现,在疫情监测的第5周后SCL-90的抽样调



注: *代表 $P<0.05$, **代表 $P<0.01$, ***代表 $P<0.001$ 。

图1 T1对T2心理健康症状影响及其链式中介效应

查中发现个体的心理健康症状总分已逐渐趋近于2018—2019年的参照水平^[2]。然而,与横断面分析不同,本研究结果表明,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症状检出情况相比于疫情前严重,说明疫情流行期间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这种差异可能由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台风眼效应引起,即远离灾难中心区的个体心理反应可能会更大^[13]。本研究结果表明,T1阶段的心理健康症状会显著影响T2阶段的心理健康发展。因此,在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相关工作者应当积极关注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群体,采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帮助其缓解因应激事件带来的心理紧张感和不适感。

本研究链式中介模型结果显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在疫情前和疫情流行期心理健康症状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依恋焦虑会导致该类型产生较高的依恋回避行为,进而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消极的方式来应对疫情这一应激事件,最终导致T2期间心理健康症状更差。虽然学生在家上网课增加了与父母相处时间,但是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个体无法从家庭中获得心理满足和安全感,导致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学生回避表达负性情绪,进而采用消极的方式应对心理应激反应。该检验还发现,消极应对方式降低了疫情流行期间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其中,“心理应激系统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个体遭遇应激事件后的心理状态,此时个体的身心反应受个体的内在心理资源(如应对方式、人格特质等)与外部环境资源交互影响^[14]。在疫情流行期,新冠疫情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测,实行封闭管理的持续时间也难以预料,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学生在环境中更可能使用消极的方式应对和缓解当前的压力情境。其他研究也发现,消极应对方式在心理应激反应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15]。本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疫情流行阶段使用消极应对方式可能会导致在此期间产生更严重的心理健康症状。因此,高职学生在面临急性公共卫生事件或灾难时,应学会以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压力,调适自我心理健康^[16],避免陷入心理危机状态^[17]。

封闭管理前期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的高职学生往往在封闭管理期间有着较高的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这就越有可能导致个体采用消极的方式应对压力,进一步降低了个体封闭管理期的心理

健康水平。本研究结果揭示了高职学生封闭管理前后心理健康症状的变化,并突出了消极应对方式和成人依恋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对构建急性公共卫生事件和灾难心理危机干预措施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研究只考虑了T2的消极应对方式和依恋类型,缺乏T1的相关数据,不能完整考察三者的交叉滞后关系;第二,本研究没有收集疫情后期的数据,没能很好地反映疫情前、中、后期三个阶段的心理反应特征。

参 考 文 献

- [1] 刘湘玲. 高职学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与入学时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0, 28(10): 1500-1503.
- [2] 苏斌原, 叶苑秀, 张卫, 等. 新冠肺炎疫情不同时间进程下民众的心理应激反应特征[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79-94.
- [3] 王锡爱, 杨菁华, 苏苗, 等. 我国“新冠肺炎”相关心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应用心理学, 2021, 27(2): 178-188.
- [4] 郑钟艳, 韦臻, 梁晶晶, 等. 应激性生活事件与超重/肥胖青少年内化问题: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J]. 应用心理学, 2018, 24(1): 23-32.
- [5] 孙道凯, 廖传景, 余如英. 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焦虑的关系: 应对方式的作用[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43(6): 114-120.
- [6] BAR-HAIMA Y, DAN O, ESHEL Y, et al. Predicting children's anxiety from early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07, 21(8): 1061-1068.
- [7] 向光璨, 滕召军, 郭成, 等. 父母、同伴依恋与希望的相互作用模型: 一项大学新生的追踪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1, 37(3): 371-380.
- [8] 李同归, 李嘉, 秦和平, 等. 大学生依恋类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10): 740-743, 748.
- [9] 竺培梁. 大学生成人依恋、应对方式与负性情绪的关系研究[J]. 心理科学, 2007(5): 1087-1090.
- [10] LI J N, ZHANG R, WANG L X, et al. Chinese public's panic buying at the beginning of COVID-19 outbreak: The contribution of perceived risk, social media use, and connection with close others[J]. Current Psychology, 2022, 41(11): 8157-8166.

- [11] 刘红云. 高级心理统计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59-79.
- [12] 王文超, 伍新春. 共情对灾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感恩、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学报, 2020, 52 (3): 307-316.
- [13] 杨舒雯, 许明星, 匡仪, 等.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的客观危险与主观恐慌: 全球范围内的“心理台风眼效应” [J]. 应用心理学, 2020, 26 (4): 291-297.
- [14] 姜乾金. 心理应激多因素系统 (综述): 20年来对心理应激理论及其应用的探索 [C] //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第12届年会论文集. [出版者不详], 2006: 14-19.
- [15] 胡燕, 许川勇, 王若彤, 等. 新冠疫情期间学生的心理应激反应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 [J]. 应用心理学, 2021, 27 (1): 57-65.
- [16] 尹锡杨, 卢泳芯, 邓彩凤, 等. 中学生生活事件对抑郁程度的影响希望特质的中介效应 [J]. 校园心理, 2019, 17 (5): 373-376.
- [17] 邝佳娜, 陆爱弟, 尹锡杨, 等. 新冠疫情下大学生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J]. 心理月刊, 2020, 15 (20): 60-61.

*通讯作者: 倪亚丽 电子邮箱: HSniyal@163.com

(上接第32页)

全过程, 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项目。通过对一系列具体任务的讨论与思考,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使学生之间形成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探索性学习的氛围。

5.3 模拟教学法

模拟多种场景, 如年度经营计划讨论、客户信用评估、业绩推荐会、经营专题讨论, 营造真实的问题情境, 让学生扮演职业角色 (如债权人、股东、高管、财务、销售员、采购员、生产者) 对相关数据进行讨论分析, 发现和诊断企业的问题, 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感悟职业角色的内涵。

6 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数据与会计专业以专业核心课建设为突破口, 推进专业数字化改造与转型升级。学校“财务大数据分析”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团队按照“定位、衔接、重构、融合、创新”的课程建设路径, 开展探索与实践。本研究从精准定位课程目标, 合理安排课程衔接, 重构教学内容、教学

环境、教学资源, 实现“岗课证赛”, “业财数技”深度融合以及教学方法创新五方面探讨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思路 and 观点。该课程目前还在建设与实践摸索中, 课程改革和建设需要不断优化和提升,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适应时代的需要。

参 考 文 献

- [1] 央广网. 2021年影响会计人员的十大信息技术榜单出炉 观点: 会计人员或转型为数据分析师 [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833045795236581&wfr=spider&for=pc>.
- [2] 孙义, 牛力, 黄菊英. 大数据财务分析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1.
- [3] 张金昌. 财务分析智能化的实现方法 [J]. 财务管理研究, 2019 (3): 1-7.
- [4] 宫莹. 中兴新云服务有限公司总裁陈虎: 从“账房先生”到企业的“数字神经网络” [N]. 中国会计报, 2018-11-23 (5).
- [5] IFAC. 面向未来的职业会计师 [EB/OL]. [2022-08-01]. <https://www.ifac.org/system/files/publications/files/IFAC-Accountancy-Skills-Evolution.pdf/>.